

美国万里纪行

梁亦平譯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美国万里纪行

（一）

美国



美国万里纪行

美國万里紀行

梁亦平譯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廠胡同73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351號

外文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總字0873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1 5/8 字數30,000

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5,000

統一書號：T 3008·10

定價：(5) 一角三分



譯 者 的 話

由于美國政府中的反动分子的人为限制，阻撓各國人民間的文化經濟交流，美國的真实情况不容易为外國人所知道。1955年，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訪問了美國，接触了美國各方面的社会人士。苏联“新时代”雜誌記者別列日科夫当时参加了这次訪問，他的这篇报道，反映了美國人民反对侵略战争、要求和平共处的普遍情緒，同时也报道了美國劳动人民在独占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統治下，生活上遭受苦难的若干側面。为了帮助讀者了解美國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，特將本文翻譯出版。文內的一些注釋，是譯者附加的。

我們搭“法蘭西之島”号郵船，在1955年10月17日到达紐約，在美國一共逗留了33天。在这个期間，我們是在不停地旅行，還參加了許多次集會和座談會。

我們從大西洋岸邊到了太平洋岸邊，又從那里折轉回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好像這次旅行，花去的時間，不止33天似的。但是，我們等候這次旅行的時間，卻比這更長，因為我們差不多花了九個月的時間才領到了到美國去的入境簽證^①。

我們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一共有七個人。團長是“真理報”的鮑里斯·波列伏依同志；團員有“消息報”的維·波托拉茨基同志，“星火圖報”的安·索弗羅諾夫同志，“國際生活”雜誌的鮑·伊扎科夫同志，“文學報”的尼·格里巴切夫同志，“共青團真理報”的阿·阿朱別依同志和我。我是代表“新時代”雜誌去訪問美國的。

在美國，我們利用飛機、火車和汽車等交通工具，總共走了一萬公里的路程。在紐約耽擱幾天以後，我們就坐火車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（位於美國東北部伊利湖的南岸），又從那里坐飛機到猶他州的鹹湖城（位於美國西部），然後

① 入境簽證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到別國去旅行時，必須攜帶的一種證明文件。沒有這種證件，就不能入境。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妨礙國外與本國人民間的友好往來，就往往用不給入境簽證的辦法來加以阻撓。

到內華達州的雷諾（位于美國西部），再从雷諾搭上公共汽車，沿着淘金熱^①的道路，經過弗吉尼亞城和卡孫城（都在美國西部），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拉門托（在美國西部，位于卡遜城和舊金山之間）。我們從薩克拉門托坐飛機到了舊金山（美國著名的沿海城市），又坐“南太平洋黎明號”快車，沿着風景如畫的太平洋海岸，到了洛杉磯（是舊金山南面的沿海城市）。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，就是費匿克斯（美國西南部的一个城市）。這是亞利桑那沙漠中一塊名符其實的綠洲，那地方活像一只鳳凰，難怪它也就取上這個名字（因為在英文中，“費匿克斯”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鳳凰，而費匿克斯這個地方確實是非常美麗）。從亞利桑那，我們又坐飛機到華盛頓（美國的首都），最後回到紐約。後來，我們坐了一架法國航空公司的班機，回到了歐洲。

我們在美國，在西歐，以及回到蘇聯的時候，人們常常問起：在訪問美國時，什麼東西給我們的印象最深。我們的回答自始至終是：人民，普通的美國人。所以，我想，最好還是讓我先談談我們對美國人民的印象。

一、美國人民對冷戰的看法

我們在美國時，很少碰見這樣成天價鼓吹着所謂“實力

① 1848年，在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，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們涌向那里去淘金，這件事情就叫做“淘金熱”。

地位”政策的人。据我看來，这种政策正在嚴重地危害着美國自己。但是，我們却碰見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的美國人，还看到了他們对各种事物的反应。我們和他們一起，進行过許多次交談和接触，有的是公开的，有的是非正式的，也有的是在私人家里举行的。

我們一般的印象是：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很好客的，很直爽的。他們有着强烈的幽默感，很会享受生活中的乐趣。当然，除此以外，他們还有着許多其他的优点，譬如說：他們办事敏捷，有進取心，精力充沛，一般都有專門的技能，等等。

可是，在美國人的性格里面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征。那就是：一般的美國人对國內外政治，似乎都不关心。有許多人好像認為政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惡，因此最好还是对它躲避得远一些。很明顯，这种情緒的產生，是因为他們对那些職業政客普遍不信任，是因为那些政客們臭名昭彰地在干着一些黑暗的政治勾当。在这次旅行中，我曾經好几次听到下面的这样一个故事：

有的美國家庭生下孩子后，父母親想推測一下他們的孩子將來長大了干什么事，就把一張鈔票和一瓶威士忌酒放在孩子的面前。如果孩子去拿鈔票，那末这是一个好的朕兆。說明这孩子長大后，会成为勤劳富裕的公民。如果孩子去拿酒瓶，那末他在長大后，大概就会成为一个酒鬼。但有一个孩子，却同时又拿鈔票，又拿酒瓶，弄得母親高声叫喊起

來：“天哪，他將來要成為一個政客啦！”

這是人民對政客們的一個諷刺。凡是和我們談過話的人都說，因為大家普遍對政客們不信任，因此每當投票選舉時，大約只有半數的選民參加投票，而且是勉勉強強地去參加的。

不過，形勢的發展，却迫使美國人民關心政治問題，關心他們政府的對外政策，關心他們和蘇聯之間的关系。這種關心每天都在增長着。在踏上美國的國土以前，我們就注意到了這一點。

在“法蘭西之島”號郵船上，旅途中曾經開了一次為船員們義務演出的音樂會。參加這次演出的人里面，有些人是一個美國劇團的團員，他們剛剛在西歐演出後回國去。其中有一位舞台監督對我們說，他感到非常榮幸，因為他是第一個歡迎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美國人。他預祝我們成功，並且希望我們這次的訪問，能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。船上的其他許多美國人，比如一位住在紐約的金融家，一位住在佛羅里達（美國最東南部的一個州）的小兒科大夫，一位住在芝加哥的律師，一位住在費城（紐約南面，離紐約很近）的音樂家，一位住在曼阿美（佛羅里達州的一個都市，是個著名的休養地）的冷凍工廠的老板和一位住在新澤西州（紐約南部一個很小的州名）的護士，也都異口同聲地說出了這個共同的願望。

我們曾經有好幾次機會，和維克多·布雷西亞先生在船

上一塊散步聊天。布雷西亞先生是紐約福特汽車公司（美國最大的汽車公司之一）的推銷員，是一個意大利血統的美國人，這次他和他的太太從意大利回到美國去。布雷西亞先生認為自己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，因為他的原籍顯然是意大利，但他是在美國出生和長大的，而且又在美國上學，所以他說出的一切，也就是美國人民心里要說的話。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布雷西亞先生就在巴頓將軍的手下服役，與德國法西斯作戰。當美國軍隊和蘇聯軍隊在易北河（在德國）會師的時候，布雷西亞先生也在那里。現在，作為一個推銷員，他在美國各地東奔西走，常常和不同階層的許多人發生接觸。

布雷西亞先生對我們說：“請你們相信我，美國人民是要求和蘇聯和平相處的。如果有人想要他們改變這種態度，那是很困難的事情。就拿我自己來說吧，沒有理由會使我重新拿起槍杆來，去參加我認為是非正義的戰爭。”

我回答說：“但是，如果人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，那末他們是會被別人欺騙的。甚至仗打起來了，他們還蒙在鼓里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到那個時候，也就太遲了。”

他說：“是的，是太遲了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們才需要相互了解。我們美國人民應當更多地了解蘇聯。近來，到處可以聽到所謂‘蘇聯威脅’之類的話，可是這些話從來沒有嚇倒過任何人，反而使得人們更想知道關於蘇聯的情況。”

这次旅行中，在我們到过的每一处地方，都可以感觉到美國人民对苏联的深切关心。原來，我們以为：由于將近十年的“冷战”和歪曲宣傳的影响，这次我們在美國受到的接待一定会是有限度的，甚至会冷淡的。可是，事实却和我們的預料相反。

我們不是电影明星，也不是鋼琴家或歌唱家（这些人可以支配观众或听众的情緒，可以常常引起別人的注意）；但是，僅僅因為我們是苏联人，當我們到了美國以后，我們一样到处受到欢迎。人們在報紙上看到了我們的照片，或者在電視机上看到了我們，當他們在街上碰到我們的時候，就會認得出來。這時，他們常常停下來和我們握握手，對我們說几句善意的話。小学生們常常一大羣涌上來把我們圍住，要我們簽名留念。每當我們在賣橘子汁的小攤旁邊停下來的時候，人們就會笑嘻嘻地歡迎我們，並且向我們探問：“你們是不是就是登在報紙上的那些俄國人？”

在我們所到的每一个城市里，总是有大批鮮花、巧克力糖或者友好的信片送到我們住的旅館來。姑娘們往往在街上把我們攔住，在我們的衣襟上別上一朵白石竹花，或是一朵紅玫瑰。現在，我們已經回到莫斯科，而我在我們的“新时代”雜誌編輯部里，發現了許多來信，都是從我們沒有到過的美國城市寄來的。這些寫信給我們的人，都表示很遺憾，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和我們見面。他們希望美國和苏联之間的友誼將會更加親密起來。

我們在舊金山的時候，曾經和一羣美國記者舉行辯論。辯論會的會場有 500 多個座位，都擠得滿滿的，甚至在過道上、走廊里也都站了許多人。據說這些人都是買了價錢很貴的票才進來的。

在这次和后来的几次辯論會上，旁听的人都站在我們这一边支持我們。我們对每个問題的回答，都引起了热烈的鼓掌。有些美國記者提出了很尖銳的問題，想把我們弄得下不了台，可是往往遭到會場里的人們猛烈的反对。每次當我們坐飛機的時候，飛機里其他的旅客也常常把我們圍住，向我們提出問題。有的时候，我們担心这样一來，飛机会失去平衡。

在我們到洛杉磯去的路上，有些官員警告我們，說我們將會在好萊塢（美國著名的制造影片的城市）碰到一些困难，因为那里的人对苏联人是毫不热心的。我們注意了这些人的警告，因为在过去几年里，好萊塢曾經出了不少的反苏影片。可是，出于我們的意料之外，好萊塢對我們招待得非常親熱，非常周到。那些電影導演、著名的電影制片人、寫電影劇本的作家，對我們都很友好。有一次，他們還陪着我們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四點鐘，看他們最新出產的影片。

每當我們參觀一所大學時，教室里碰巧總是空着的。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。但是，在大学的校園里和閱覽室里，我們却碰見了許多大學生。他們總是向我們提出許多問題。一小羣人很快就會變成一大羣，大家臉上都露着笑容。

我們在柏克萊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參觀了“加利福尼亞人報”的編輯部，並且和這家報紙的一些寫稿人見了面。於是，馬上就來了一場臨時考試，問長問短的。這充分表明了美國青年很想多知道一些關於蘇聯的情況。從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當中可以看出，他們對蘇聯是不太了解的。譬如說，有人這樣問：在蘇聯，高中畢業生上大學，是不是由他們自己選擇的？或者是不是政府叫他們進什麼大學，他們就得進什麼大學？大學生是不是可以出版自己的報紙？他們念書的錢是從哪里來的？蘇聯有沒有像工資這樣的東西？做父母的是不是可以撫養自己的兒女？是不是孩子一生出來就由政府帶走？讀到這篇報道的人，也許會覺得這些問題非常奇怪，但是，如果大家沒有忘記，一般美國人是容易得到關於蘇聯的真實消息的，那末，對這些問題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。

我們常常從口袋里，掏出我們的孩子的照片來給美國人看，人們總是贊嘆地說：“多麼可愛的小孩啊，就跟我們的孩子一樣！”

許多美國人都承認，曾經有人要他們相信，“共產黨”國家的孩子是和別的孩子不一樣的。

我們在費匿克斯的時候，訪問了附近的一個俱樂部，這個俱樂部是剛剛建立起來的。這個地方是在亞利桑那沙漠中間，藏在一座光禿而荒涼的小山後面。可是我們沒有想到，當我們坐的汽車一拐過那座小山，就看到了一片綠茵茵的草地。在草地中間，有一個很大的游泳池，四周種着高大的棕

欄樹和巨大的仙人掌。另外还有一个網球場和一个寬敞的停車場。在美國，停車場在設計房屋建筑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，因此，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停車場。目前，在費匿克斯，只有电影院是人們唯一的娛樂場所。那里的人們，很久以來就想盖一座市立戲院。起初，他們想把戲院造在市中心，可是因为市中心附近一帶沒有一个合適的停車場，只好把戲院盖在城外。

主人請我們在一個大餐廳里吃飯，从这个餐廳里，可以清楚地看見那塊綠油油的草地。我們在亞利桑那逗留的几天，和許多人見過面。而这里和我們一起吃飯的人，大多數都是已經見過面的。我和德里克·范戴克談了起來；范戴克先生是那里的一位有名望的律師，而且还是一个有勢力的公眾領袖。我們在前一天就到他家去拜訪，在他家里，會見了他的夫人，一位相當有風韻的主婦，和一个十二歲上下的女兒，一個九歲、一個七歲的兒子。范戴克先生自己長得很高大、很結實，他的臉長得又圓又胖。人們都喜欢會見范戴克先生一家人。而这次在俱樂部里，我們覺得我們好像是老朋友一樣。

在我們的談話中間，我們談到了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关系，也談到了我們兩國人民之間更好地互相了解的必要性。

范戴克先生說，美國和蘇聯之間已經開始有代表團來往，对这一点感到很高兴。美國人和从蘇聯來的人見見面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这样一來，美國人可以自己去判斷事物，

不必再去相信那些宣傳了。

他接着說：“可是，我們這兒有些有权势的人，他們不喜歡和苏联有更密切的关系。我要参加接待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委員會的工作，但是当这个消息傳出去以后，就有些人到我家來，叫我不要去参加。美國退伍軍人团^①的職員們曾經上門來，叫我不理睬俄國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，我曾經在美國駐在太平洋的空軍里服务过，可是我沒有机会碰到苏联人。所以，这次我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。現在，我發現你們並沒有和我們不同的地方。我相信，我們兩個國家是可以做朋友的。”

有人企圖對我們這些从苏联來的訪問者進行搗鬼，試圖引起人們對我們苏联新聞界代表的敵視，好中斷我們在美國的旅行。我們在美國旅行的期間，这种陰謀活动一直沒有停止过。这里，我特別想提一下这件事情：當我們在克利夫蘭、在洛杉磯和在費匿克斯的時候，那里的一些流氓就跟我們搗亂。很明顯，这是有人指使他們这样做的。

說到這里，我想談談富蘭克·克拉克霍先生，他是美國國務院派來陪伴我們的。克拉克霍先生一直陪着我們游覽，使得我們免除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。譬如說，我們在克利夫蘭的時候，那里的流氓就跟我們搗亂。當時，警察毫不在乎地站在旁邊看熱鬧，克拉克霍先生想要制止这种暴行，連他自

① 美國的一個退伍軍人的法西斯組織。

己也吃了苦头：一个流氓打了他。一般來說，克拉克霍先生是个好人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國人，他有活力，待人很热情，而且还有一种很有風趣的幽默感。他尽了很大的努力，來幫助我們了解美國和美國人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們非常感謝他。

不过，在这里我們也想提一下美國國務院派來的翻譯埃德蒙·格倫。我們对他就不能和克拉克霍先生相提并論了。我們很快就看了出來：虽然他表面上裝着一付待人殷勤的样子，但是，他想要我們相信他是公正善良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他很不公正，他也不可能掩飾他这种不公正的态度。在克利夫蘭，当流氓跟我們搗乱的时候，他一直坐在警察車里，沒有出來。不光这样，他还把这种流氓行为說成是“自由和民主”的最好范例。可是，我們所碰到的美國人和絕大多數的美國報紙，都說这种行为是丟臉的，是有失体面的。当克弗維爾委員會^①在調查壟斷資本的时候，格倫却硬說美國根本沒有壟斷資本这种东西。在密西西比州薩姆納地方，一个黑人孩子被殺害了。但是当美國報紙在指責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格倫先生却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，在美國，黑人問題早已圓滿地解决了。

从所有的迹象中可以看得出來，他还向我們碰見過的美國人供給关于我們的“消息”，这种“消息”的性質和前面

① 克弗維爾是美國民主黨議員，是美國犯罪調查委員會主席。

說過的是差不多的。譬如說，在華盛頓的一次招待會上，他叫美國記者不要相信我們說的話，他認為我們是“一羣特別狡猾的人物”，而且還有“顯明的詭計”。他所报道的“新聞”送到了報館。“華盛頓每日新聞”把它全部發表了，而且還給格倫先生本人加了一些刻薄的按語。

談到美國人的時候，我一定得談一談新聞工作者。雖然他們人數並不多，但是，毫無疑問，他們是美國社會中一個有勢力的部分。我們到達紐約的头一天，就開始去了解他們的工作和一般的美國報刊。當天，我們參觀了“紐約時報”的編輯部和印刷廠。我們在這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。一路上，我們每到一個城鎮，都要參觀一家地方報館。就在我們動身回國以前，我們還和“紐約先驅論壇報”的工作人員一起，開了一次時間很長的座談會。

在這篇報道里，我不打算討論美國的報刊。但是有一點我要提一下：我們的美國同行們一致強調說，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合作是很重要的。在華盛頓記者俱樂部里，我們建議設立一個年獎制度；如果任何一個美國的或是蘇聯的新聞工作者，對加強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有很大的貢獻，那末他就可以得到這種獎金。我們的建議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。

當然，我們是歡迎美國新聞工作者所表示的友好感情的，雖然這些友好的感情並不常常用實際行動來支持。10月31日的“時代”雜誌刊登了一條消息，故意歪曲地報道了我們在“紐約海外記者俱樂部”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。我們相

信，这是因为这家雜誌的主筆錯听了一个不老实的記者的报道。于是，我們寫了一封信給这位主筆。我們在信里說明了事实真相，并且要求他把我們的信在下一期雜誌里發表。但是可惜得很，这封信到現在还没有發表出來，大概这家雜誌認為沒有必要回答我們。

这件事情說明：并不是每一个新聞工作者都可以決定他的報紙的編輯方針的。許多新聞工作者坦白地告訴我們說，只有当符合報紙發行人和主筆們的計劃时，才允許有新聞自由。當我們問“你們可以批評你們的主筆嗎？”的時候，常常會發出笑声。現在，我們完全懂得了这种笑声是什么意思。

不用說，美國報紙在羣众心里，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响。每当一个美國人看到一条含糊不清的消息的時候，他的常識就使他能够正确地判断事物。拿反苏宣傳來說吧。多年以來，有些喜愛“冷战”的人們一直不停地在進行反苏的宣傳，而所謂“苏联威脅”，就成了各家報紙头条的標題。可是，这样做到底產生了一些什么結果呢？

我們跟很多人談过話，但是在这些人中間，沒有一个是同情“冷战”的。相反的，他們都相信美國和苏联是可以和平共处的，可以合作的。

我們所碰到过的美國人，大半都屬於中產階級。我們也訪問了像大制造商、金融家和銀行家这样的大資本家。我們也同州長、市長和其他官員談过話，他們都認為美國和苏联